

政治科学之梦

——读《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

储建国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储建国(1971-), 男, 安徽潜山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6-0883-02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叶娟丽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描述了一个脆弱却恒久的梦想, 那就是政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做着“科学”梦想。

柏拉图坚信可以将数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 并计算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所需要的人口。亚里士多德将“根据科学规则轮流统治”称为政治的统治, 他通过某种比较的方法, 试图发现这种规则。古希腊的梦想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它们发出的智慧之光仍然启示着当代的政治学者。到了中世纪, 这个梦似乎中断了, 奥古斯丁闭上了眼睛, 祈求上帝的启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打开了欧洲人闭了很久的眼睛, 政治学开始了新的梦想。“奥卡姆剃刀”为这种梦想指出了一个延续至今的方向。马基雅维利相信那些可观察到的政治现象背后必定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霍布斯则幻想像“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那样的政治科学原理。自此以后, 科学成了笼罩政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 政治学者要想证明自己的研究更有价值, 似乎只有声称它比以前的研究更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只是将这种梦想带到了一个更为纯粹的阶段, 其纯粹性的标志就是“测量”。梅里亚姆指出, 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某个问题提出某种假设, 然后经过精确的资料计量和检验来确认或否认这个假设。本特利认为只有可以测量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 没有测量, “就不可能获得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材料”(引文全部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 下同)。很快地, 测量的技术成为美国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者需要掌握的技术。正如赖斯所说, “在美国社会科学家中, 崇尚定量方法的价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只满足于关心那些特殊的不能用测量方法证明的情况或者问题, 是非常愚蠢的”。然而, “测量”这把剃刀所剪除的东西太多了, 它甚至把政治中最核心的方面排除在研究大门之外。这或许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短暂繁荣之后迅速衰落的一个原因。

应该说, 行为主义政治学只是人类政治科学之梦的一个片断, 但却是最清晰的一段梦想。为了再现和反思这段 20 世纪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学之梦,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一书用清晰的语言准确描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产生、繁荣和衰落的短暂历程, 并带领读者对行为主义所承载的政治科学梦想进行了反思。

(一) 该书认为,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梦想有两大核心要素, 一是“价值中立”, 二是“实证方法”

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 意识形态总是如影随形, 这是让研究者感到头痛的一个问题。政治学与意识形态距离更近, 在西方学术史中, 政治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意味着一次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意识形态的论证工具, 这让那些追求客观性的政治科学研究者不满意。自 19 世纪初以来, 越来越多的政治研究者努力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这种倾向逐渐发展成“价值中立”的强烈主张。作者认为, 行为主义者中严格的价值中立论者要求政治科学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客体、研究过程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要坚守价值中立, 也就是说, 一项政治学研究自始至终都与价值无关。杜鲁门就强调, 政治学研究的结论不需要为现实的政治生活或政治改革提供任何规范的描述, 认为自己的研究与改革无关, “不是为了政治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而只是寻求‘纯粹的’科学解释”。随着二战后西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 传统的政治裂缝似乎已经弥合, 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引起不了人们的兴趣。正如古德温所说, “意识形态已经被政治上的一致和学术上的科学方法所取代”。作者认为, 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崇拜纯粹的科学的研究, 主张政治学研究‘价

值中立’的重要原因”。

清除掉价值之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剩下的任务就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提出假设,收集和处理政治生活中的无情事实,通过某种可以重复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假设。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目标是立足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尽可能地将研究资料量化,将政治学变成一门预测和解释的科学。本书归纳了行为主义实证研究的六大步骤,并通过一些案例分析,说明行为主义者通过实证方法的确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有的发现了人们难以直觉发现的关联,有的证实了人们难以肯定的观点,有的则纠正了人们的一些常识性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们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威廉·赖克统计了《美国政治学评论》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所有文章,发现 2/3 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和复杂的统计学知识,他认为此一趋势可喜可贺,并声称,传统政治学所提供的只是“智慧”,而只有实证的政治学才提供了“科学知识”。

(二)该书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两大核心要素进行了中肯的、有分寸的而且独到的批评

首先,本书指出,政治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价值中立”。作者引用施特劳斯的话说,“不下价值判断,便无法研究政治现象,因而政治学不能够,且不应该成为‘价值中立’”,认为政治学的研究主体无法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自己在做出每一项选择时,几乎都是价值引导的,因此要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受自己价值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而且,政治学研究对象一般都包含着利益之类的规范性概念,而利益从本质上讲就是价值。另外,政治学研究成果必须涉及价值判断和选择,政治学有着比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更高的价值,它们帮助人们进行取舍,为了某种理想目标,维护或改变现实。从政治学的发展史上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价值中立”的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其实也没有做到他们所声称的真正的“价值中立”,而是将反对政治变革的某种价值观念隐含在研究之中,反映了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意识形态相对主义的倾向。拉斯韦尔坦承个人的价值偏爱都会在研究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自己的政治科学是植根于美国人的价值判断,而且明确指出政治科学的重心就是民主的政策科学,其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的尊严。达尔以美国民主为蓝本,描述了多头政体的特征,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逐步走向多头政制。利普塞特宣称,人类自古以来为实现理想社会而进行的探索可以结束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是一个现实中的好社会”。作者指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实质是意识形态相对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意识形态的隐藏。

其次,本书富有特色地指出,行为主义唯实证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新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形而上学,指的是那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兴盛于 15 至 18 世纪,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它尽管对于克服过去抽象地、思辨地、大而化之地看问题,引导人们重视事物的具体细节,分析其特殊的因果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习惯: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方法,它将人的社会与物的自然界等同起来,认为可以用同一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在这一点上,行为主义方法与近代实证主义方法有类同之处。作者指出,行为主义政治学过于物化,过于量化,过于技术化,过于琐碎化,使政治学越来越局限于那些与政治生活没多大关系的细小方面,从而重新陷入实证主义曾经有过的形而上学泥坑。之所以称为新形而上学,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主义政治学所面临的科学背景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变化在于以数学为基础的计算机的发明,使得行为主义者产生了对计算机模拟能力的崇拜,让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工具。同时一些新的科学理论如系统理论、控制理论、信息理论、模糊理论、混沌理论、灰色理论等渗透到政治学研究领域,使得行为主义政治学比近代实证主义政治学更有能力分析复杂的、动态的政治现象。因此,行为主义这种新形而上学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旧形而上学那种孤立和静止的特征,但与马克思主义“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辩证方法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作者冷静地指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终结,是指它作为一个主流政治学流派的终结,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消亡,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主义的一切方面都被否定或者取消。行为主义者所创立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及一些基本理论框架和概念,还被继续保留,并更新发展,成为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需要扬弃行为主义:第一,我们不能搞绝对的“价值中立”,而要提倡“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生活为使命,着眼于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同时不能将政治学变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或政府政策的注释,那会带来政治学的消亡;第二,我们不能像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陷入与政治生活无关的细小和琐碎的方面,要针对政治生活的核心方面,在遵循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前提下,做系统的、客观的研究,同时防止分析问题时的大而化之,面面俱到。

最后,作者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宽容的、开放的、创新的,它既能深入研究具体的政治现实,又能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来审视当前,指导着政治生活朝着完善完美的方向发展。

这是政治学真正的梦想,古人曾做过,今人得仍然做下去。

(责任编辑 涂文迁)